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文艺理論著作选讀

附录研究資料

(六)

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编印

一九七七年三月

列 宁 語 录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选集》第二卷512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 宁 語 录

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如果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不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做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者在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列宁选集》第二卷628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目 录

列宁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 (1)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 的镜子

..... (9)

一、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摘录）

..... 车尔尼雪夫斯基 (15)

二、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摘录）

..... 车尔尼雪夫斯基 (45)

三、怎么办（节选）

..... 车尔尼雪夫斯基 (63)

四、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摘录）

..... 普列汉诺夫 (171)

五、琉森

.....列甫·托尔斯泰 (207)

六、舞会以后

.....列甫·托尔斯泰 (237)

七、进步和教育的定义

.....列甫·托尔斯泰 (249)

八、克莱采尔奏鸣曲(节选)

.....列甫·托尔斯泰 (257)

九、当代的奴隶制度

.....列甫·托尔斯泰 (260)

十、列甫·托尔斯泰书信日记序跋选

..... (326—38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文艺理论著作选读附录研究资料

编后说明

列宁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摘录)

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①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②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③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

贵族时期最出色的活动家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当时还存在着农奴制，根本谈不到把工人阶级从“卑下的”、“龌龊的”、无权的农奴等级的一般群众中划分出来。当时以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为首的没有经过审查的一般民主主义报刊，是工人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的先驱。

正象十二月党人唤起了赫尔岑一样，赫尔岑和他的“钟声”杂志也促进了平民知识分子的觉悟。所谓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商人、农民。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的总结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

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

在农奴制崩溃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一般解放运动的、特别是民主主义的没有经过审查的报刊的主要群众活动家。民粹主义成了符合平民知识分子观点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流派永远不能同右的自由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但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发自由派叛卖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直到现在还痛恨的。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一個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

（《列宁全集》20卷240—241页，人民出版社）

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摘录）

像西欧的启蒙者和60年代的大部分文学代表者一样，斯尔卡金（按：列宁在注里指出当时他不便举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拿斯尔卡金作例子，实际上他说的正是前者）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

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出来，或者只是处在解放之中），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着重指出：这个遗产里面没有任何民粹的东西。……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

（《列宁全集》第2卷443—445页人民出版社）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摘录)

我们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百般吹嘘和粉饰过的臭名昭彰的农奴主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立场上，怀着愤怒的心情责难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完全推翻这种政权的一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会不在农奴的头脑中发酵。虽然若干世纪的奴隶制把农民群众压得这样厉害，使他们这样愚昧无知，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是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60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在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在2月19日50周年纪念的时候，自觉的无产阶级必须尽量明确地了解到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

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潮流“让步”，自由派过去是现在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派只限于“争取改革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如何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政权。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個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粉饰、后来甚至加以歌颂的61年的“农民改革”，称为卑鄙龌龊的事情，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清楚地看到，那些自由派的解放老爷们把农民抢得精光。车尔尼雪夫斯基把60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面前战战兢兢、他们在统治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

了，而且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了。鼓吹满足于“文化”工作、规避革命的地下工作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起来了。它们最初是混合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主义者的空想思想体系和书生气的斗争里的，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者的革命斗争过渡到革命阶级本身的斗争而开始分道扬镳。

革命前的10个年头（从1895年到1904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他们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鼓动、组织和党日益发展。特别是从1902年起，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开始了群众性的斗争。

（《列宁全集》17卷104—106页人民出版社）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摘录）

在费尔巴哈的德国学生阿·劳批判康德之后没有多久，俄国的伟大著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开始试图公开地表明他对费尔巴哈和康德的态度。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了，可是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甚至连费尔巴哈的名字也不许他提到。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付印的“艺术和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第3版序言中，试图直接提出

费尔巴哈，可是书报检查机关即使在这一年也不准引证一下费尔巴哈，这篇序言直到1906年才和读者见面（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部第190—197页）。在这篇序言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页篇幅来批判康德和那些在自己的哲学结论中追随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地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全集》14卷380—382页人民出版社）

怎 么 办 ？

（摘录）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些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列宁选集》第一卷329页人民出版社）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摘录)

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上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5—306页，人民出版社)

弗·列 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许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没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满版都是祝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着伪善，简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论报》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

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用声嘶力竭的叫嚣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粗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也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像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且毫无

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变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讲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们革命中的这